

Shehui renshi yu shehuixingtai yanjiu congshu

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研究丛书

欧阳康◎主编

教条主义根源论

JIAOTIAO ZHUYI GENYUANLUN

刘保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研究丛书

欧阳康◎主编

教条主义根源论

JIAOTIAO ZHUYI GENYUANLU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条主义根源论 / 刘保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161 - 7683 - 2

I. ①教… II. ①刘… III. ①教条主义—研究 IV. ①B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761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金 沛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陕西理工学院科研计划资助项目 (SLGQD15 -08)

总 序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研究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自笔者于1986年起在国内哲学界倡导并实际开展社会认识论研究以来，我们关于社会认识论的思考与研究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学术历程。总体上看，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对于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以《社会认识论导论》的出版为标志，主要围绕论题确立、学科界定、体系构建、特点探析来展开，这一阶段的研究为社会认识论研究扫清了外围，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社会认识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主要任务是将研究由理论层面向方法论层面延展，突出社会认识方法论，使社会认识论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可供实践和操作借鉴的方法论和方法论原则；第三阶段的研究将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作为主攻方向，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在理论层面上展开社会认识活动的专门化和典型化形式，社会认识论要在帮助人们更加科学地认识社会和自我方面发挥作用，就必须关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部著作中；第四阶段是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社会形态和认识问题的研究。

从立足于一个新的学术和时代高度来看，这些年来社会认识论的发展经历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程。首先，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由比较狭义的社会认识活动进入对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及其互动关系问题的广泛关注；其次，研究思路不断更新，由比较单一的认识论研究到与本体论、价值论、评价论、实践论、决策论等研究思路的综合应用；再次，研究方法不

断丰富，大量借用哲学和现代科学方法论，并努力综合地运用和解答问题；最后，问题意识更加鲜明，越来越清晰地指向当代人类和中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且力求作出有理论深度和对策论意义上的解读。

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得以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博士生和硕士生们不断地加盟。笔者自198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先后有20多位博士生和30多位硕士生加入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共同体。研究生们不仅积极参与到社会认识论的课题研究中，也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提出和研究了一系列新问题，推动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撰写的比较直接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有：《社会认识的评价机制》（乔志勇）、《社会认识的预见机制》（何小玲）、《社会认识的观测机制》（种海峰）、《社会认识的进化机制》（李勇）、《社会认识的客观性》（张建华）、《简论社会时间》（李学明）、《简论社会空间》（王晓华）、《简论社会和谐》（田伟宏）、《简论社会心态》（胡红生）、《简论社会预警》（潘斌）、《简论民族精神》（吴兰丽）等。

与此同时，一批博士研究生参与到社会认识论研究，撰写了一批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不少论文已经结集出版。例如郑文先的《社会理解论》、刘远传的《社会本体论》、叶泽雄的《社会理想论》、张理海的《社会评价论》和李勇的《社会认识进化论》等已经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收入笔者所主编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丛书”出版；吴畏的《实践合理性》、张明仓的《实践意志论》和邹诗鹏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实践生存论》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纳入笔者所主编的“实践哲学丛书”出版；夏建国的《实践规范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孙德忠的《社会记忆论》和董慧的《社会活力论》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世选的《国民素质论》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等等。

本丛书意在进一步推出社会形态与社会认识方面的研究成果，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列，将相关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研究成果持续纳入其中。首批出版由七部专著组成。其中，《社会认识论导论》是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纳入胡绳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迄今已经整整20年了，市面上早已无法购得。蒙出版社领导厚爱，《社会认识论导论》此次得以修订再版。其余六部著作都是近年来笔者所指导的博士在各自博士论文的

基础上修订完善后首次出版的，有杨国斌博士的《社会阶层论》、胡红生博士的《社会心态论》、潘斌博士的《社会风险论》、谷声然博士的《社会信仰论》、王能东博士的《技术生存论》、谢俊博士的《虚拟自我论》等。他们在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领域分别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我们衷心希望本丛书的出版有助于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当然也衷心欢迎和希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编审关心学术建设，积极参与本丛书的策划与编审。赵剑英总编从一开始就介入了本丛书的策划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为本丛书增色添彩。张林主任积极参与本丛书的设计与审校，对本丛书的最终出版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气魄和远见卓识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欧阳康

2009年1月

序

教条主义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常新的课题。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是因为自有人类文化以来就有教条主义这种社会现象存在，人类在发展的历程中屡屡遭受教条主义之祸。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常新的课题，是因为它与人类社会现实及其历史过程相伴随。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教条主义问题依然存在，有时还十分猖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觉。国内外学者都不断地在研究它，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显不够。广大民众大概没有人喜欢教条主义，但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人们又常常辨不清真理与教条的关系，时常不自觉地犯着各种教条主义的错误。直面这样的现状和问题，刘保民教授以对教条主义的“根源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致力于推进对教条主义的研究，对隐藏在教条主义背后的诸多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积极探索与全面解读。

教条主义为什么会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它的产生和形成到底有哪些原因？这些原因的存在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如何从源头上防范教条主义？等等。这诸多问题的提出，不仅涉及教条主义及其根源的理论问题，而且关乎从实践上免受教条主义“之灾”的问题。鉴于教条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上都曾反复出现并造成极大危害，因此，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角度来看，对教条主义的根源问题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学术研究，而且对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有非常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正如书名所示，《教条主义根源论》一书对“教条主义根源”从多种

学科和多种视角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挖掘和探讨。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教条主义及其根源研究综述。从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当前国内外教条主义根源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选题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以及创新之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论述。第二章，“教条主义”范畴的解读。其内容包括“教条”与“教条主义”的区别、“教条主义”范畴的哲学史探源与界定和教条主义的分类。第三章，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制度根源。主要从国家制度根源、“一元化”为主的社会体制根源、“权威者”的独断作用和党内制度根源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第四章，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意识形态根源。主要从意识形态的“单一性”的消极影响、“强制性”引发的消极作用和其“有限性”作用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揭示。第五章，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宗教根源。主要从宗教信仰绝对化、宗教信条神圣化、宗教与人本异化的角度，对教条主义根源进行了追述。第六章，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从文化历史根源、中国传统文化特征根源、文化观念根源，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消极文化因素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七章，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认识论根源。主要从认识主体的主观主义根源、认识过程的“断裂化”根源，以及教条主义者在认识过程中，对主客体关系的具体错误处理方面进行了深究。第八章，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形而上学根源。主要从教条主义者主观臆断地割裂矛盾间的关系，形成形而上学绝对化的具体“两端”化思想，和“静止性”“唯一性”的形而上学绝对化意识和观念等方面，逐一进行了揭示。第九章，结语：从源头上防止教条主义。在特别指明社会生产方式是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终极原因的基础上，从教条主义根源的差异性和同一性、教条主义的本质，以及在理论与实践防止教条主义三个方面，揭示了从源头上防止教条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根本途径。

客观说来，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与深化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教条主义及其根源的研究，展示了作者对于教条主义根源的独到探索与思考，是关于教条主义根源研究的一项优秀成果。

第一，在研究视野的广袤性上有很大拓展。长期以来，关于教条主义的根源人们主要是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认识论等方面来加以探索的，将其归结为“三大根源”，存在着“散见式”“问题式”“现象型”等研究不足。该书在此基础上将其扩展为“六大根源”，并从社会制度、意识

形态、宗教源头、文化缘由、认识论、本体论、形而上学方法论，一直追溯到社会生产方式，应该说是一次重新尝试和探索。作者尤其强调从“意识形态”“宗教”“形而上学”，到终极的“社会生产方式根源”等方面来全方位审视教条主义，这在国内学术界似乎还很少见。

第二，注重对教条主义的多学科与综合性解析。针对当前学术界对教条主义根源研究方面存在的欠“深度性”“分析性”“提炼性”等现状，该书着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哲学理论、宗教学理论、政治学理论、文化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国际共运史理论、哲学史理论等多种学科的理论视域，对教条主义及其根源进行综合性的深层理论分析，拓展和深化了对于教条主义的全面把握。

第三，直面并反思当前社会和理论界存在的相关敏感问题。教条主义贯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有的问题与某些政治和社会问题内在交织，以致多少显得有些敏感和复杂，以致在对教条主义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意回避甚至避讳的情况，妨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该书作者本着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直面问题，依据社会发展规律的态度，论证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根源。特别是在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制度根源和意识形态根源这两大根源上，体现出自己的学术风格。

第四，注重研究论证的学理性和哲理性。教条主义问题非常复杂，对其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现象描述、过程陈述和案例分析，过于表层和现象。该书作者努力凸显哲学工作者的学术特点，力图把一些问题讲深讲透，讲出作者的独到见地，做到以理服人，具有较强的哲理性 and 说服力。

刘保民博士早年曾经与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前后同学，多年来在高校从事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也承担了校级领导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不忘学术，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他克服了诸多困难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文曾经按照要求送国内有关专家双盲匿名审查，得到肯定和好评。华中师范大学林剑教授，武汉大学夏建国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张廷国教授、王晓升教授、张峰教授、万小龙教授、韩东屏教授等参加了论文答辩，对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对此我和作者都非常感谢！此书就是在刘保民教授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

教条主义的根源问题极为复杂，对其的深度理论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其的理解和预防，但这并不能直接消除其根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

社会条件下，教条主义还会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和表现出来，为此需要不断地探索和预防。希望该书的出版不是探讨的结束，而是新的起点。也希望该书的出版引起全社会对教条主义及其根源的更多关注与重视，更加自觉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好地行进在人类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大道上。

欧阳康

2015年4月12日

目 录

第一章 教条主义及其根源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	(1)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5)
第三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11)
第四节 选题将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创新之处	(20)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基本思路	(22)
第二章 “教条主义”范畴的解读	(27)
第一节 “教条”与“教条主义”	(27)
第二节 “教条主义”范畴的历史阐释	(35)
第三节 “教条主义”的分类	(45)
第三章 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制度根源	(67)
第一节 国家制度根源	(67)
第二节 “一元化”为主的社会体制根源	(79)
第三节 党内制度根源	(86)
第四章 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意识形态根源	(90)
第一节 意识形态“单一性”的消极影响	(91)
第二节 意识形态“强制性”引发的消极作用	(100)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有限性”作用	(113)
第五章 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宗教根源	(117)
第一节 宗教信仰绝对化	(117)

第二节 宗教信条神圣化	(132)
第三节 宗教与人本异化	(136)
第六章 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文化根源	(144)
第一节 文化历史根源	(144)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根源	(155)
第三节 文化观念根源	(165)
第七章 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认识论根源	(175)
第一节 认识主体的主观主义根源	(175)
第二节 认识过程的“断裂”化根源	(188)
第八章 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形而上学根源	(199)
第一节 主观臆断地割裂矛盾间的关系	(200)
第二节 形而上学绝对化的“两端”思想	(206)
第三节 “静止性”“唯一性”的形而上学绝对化观念	(213)
第九章 结语:从源头上防止教条主义	(228)
第一节 教条主义根源的差异性与同一性	(228)
第二节 教条主义的本质	(237)
第三节 在理论与实践防止教条主义	(240)
参考文献	(270)

第一章

教条主义及其根源研究综述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

（一）对“教条主义”问题的最初接触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即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批林批孔”时代，教条主义这一词语，在我的脑海里已有印象。当时，“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等口号，在校园里“响彻云霄”。作为一名幼稚的中学生，一方面，我们在课堂上读书学习，我们的《语文》《政治》等教科书中，有教条主义的概念；另一方面，在课堂外，开“批林批孔大会”，写“大字报”，画“漫画”，办“批林批孔墙报”等，接触到了要废除孔子“古教条”的思想和言论等。全国上下兴起了“批林”高潮，整个校园里，“打倒林彪”“打倒叛徒”“打倒卖国贼”的声讨林彪的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都成了“阳奉阴违”和“骗人的鬼话”，都是十足的教条主义表现，都要统统被打倒和废除。当时，整个中国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教条主义似乎无处藏身，并受到“株连”性的批判。

高考制度恢复后，1978 年 10 月，我有幸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进入政教专业学习。在各科课程学习，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过程中，对教条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在今天看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所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讲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虽然知识面较窄，“左”的倾向较严重，但学科专业的系统性却较强。从陈独秀的右倾教条主义，到李立三的“左”倾教条主义；从王明典型的先“左”后右的教条主义演变历史，到党内与教条

主义长期不懈的斗争史，使自己从正反两个方面受到了“直面”的关于教条主义问题的教育。

2004—2007年，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导师汪信砚、何萍、姜锡润、萧诗美、朱传荣等专家教授的教诲和指导下，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通过对王明教条主义的解读和研究，特别是在撰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王明的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查阅和审视了大量与教条主义有关的资料。在查阅数据的过程中，自己对教条主义的概念、表现、特征、本质、根源、批判、思考诸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对教条主义的认识。至此，自己就萌发出了系统研究教条主义的“企图”。

（二）王明教条主义研究后的“自我意识”

王明教条主义与教条主义是什么关系。这看似一般和简单的问题，而要回答清楚，实属不易，必须要有系统性的观点和一定个性的思维方法。从一般方法论角度讲，王明教条主义与教条主义是“具体和一般”的关系，但在二者的具体关系上，要作具体的思考和分析。在查阅大量二手资料的过程中，我不仅对王明教条主义问题有了系统性的了解，而且对教条主义也有了较为全面的涉猎。从“概念”到“表现”、从“特征”到“危害”、从“根源”到“批判”、从“启发”到“长远”等范畴和问题，都一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探索。自己深深地体会到，要研究王明，就不得不涉及王明的思想，特别是其典型的教条主义思想；要研究王明教条主义，就必然和必须涉及教条主义本身及其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深挖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根源。这是研究王明教条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

王明教条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教条主义能否互相替代。这一看似不是问题的問題，但事实上，自己在研究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其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王明其人在我党历史上太具有特殊性了，王明的思想特别是其教条主义思想太具有典型性了。王明自幼聪明好学，熟读“四书五经”，在上小学、中学期间，连连跳级，可谓“神童”。在武汉大学前身“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求学期间，王明在校内是学生领袖，在校外是爱国的热血青年，学生先进代表和典型，表现出十分优秀的品质，展示出非凡的才能。在被推荐至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期间，王明学习成绩非常突出，深受师生爱戴，特别是受到其导师米夫的赏识和重用，并结下了终生的师生情。但这时，王明的“左”倾思想已经抬头，教条主义思想已经有所表现。后来，有共产国际的重用，有导师米夫的“厚爱”和特殊的“关照”，加之王明本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自己的“勤奋努力”，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扮演着“桥梁纽带”角色，起着“钦差大臣”的特殊作用。当面对中国共产党时，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特殊人物；当面对共产国际时，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从组织角度讲，他所代表的支部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党的“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王明的角色才得以改变，最后病故在莫斯科。可见，王明在我党历史上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是特殊的，又是“多重的”。可以说，王明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位少见的特殊的人物。

王明与其角色相“匹配”的教条主义思想，同样是十分典型的。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我党党内统治了较长时间，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尤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从观念上讲，他的思想在我党内部长期得不到消除，后患较大，甚至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影响。同时，其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很典型，先是“左”，后是右；只唯“上”，不唯“下”；只对共产国际负责，不对中国共产党负责；只对自己的导师米夫负责，不对我党的领导集体负责；只对自己的前途负责，不对中国革命的命运负责。由此对我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的恶劣影响，都是极为严重的。

从典型意义上讲，有的学者似乎认为，王明的教条主义可以代表一般意义上的教条主义，甚至可以互相代替。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学理的角度讲，教条主义和“王明教条主义”，不论从内涵讲，还是从外延看，都是一种“种”“属”关系，即大小不同的关系。前者大，后者小；前者是“一般”，后者是“具体”；前者是学理上的“贯通”性概念和思想，后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即只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插曲”。从实践理性角度讲，教条主义的作用是一般意义上的表现，是历史长河性的作用，“王明教条主义”的作用主要是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是阶段性作用。所以，二者是不能和无法相互取代的。故而对教条主义及其根源的研究更为必要和具有价值。

从以上自己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王明教条主义”要研究，教条主义更要研究，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根源更要具体研究。

（三）研究“教条主义”及其根源的疑难

教条主义及其根源问题，应该说，它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常新的话题；既是一个常规性、一般性问题，又是一个反面性命题；既是一个人们不太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主题。从史学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在社会出现严重的“悖论”效应时期，教条主义者就会“跳出来”，教条主义问题就会产生，甚至表现得尤为突出。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根源也很复杂。在这些所谓“悖论”性的话题和现实矛盾中，研究教条主义及其根源存在一些疑难。

疑难之一：研究教条主义及其根源有无必要。有人认为，既然教条主义是一个反面命题，研究它意义不大，故没有必要。其根源研究也就没有必要。其实，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中国共产党党史，简单的追述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因为教条主义是一个反面话题，它的消极作用是巨大的，产生这种消极作用背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和坚实的。故而研究它不仅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疑难之二：教条主义及其根源有无“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关于教条主义的所谓“生命力”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既然教条主义是一个反面性话题，教条主义是“不得人心的”，它就没有生命力，研究它也没有什么必要，究其根源也无意义。其实，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稍加质问几个问题，就有了明确的答案。为什么教条主义思想在中国和国外古代就已经产生？为什么教条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经常存在？且表现的形式不同？为什么教条主义的根源不仅广泛，而且深厚？为什么教条主义屡次被打倒，又屡次抬头呢？特别是以“王明教条主义”“斯大林教条主义”等为代表的历史危害和现实危害如此之大？等等。所以，教条主义不仅有其生命力，而且其生命力还十分的顽强。教条主义是一种僵化的思想，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是一种“独断主义”的行为和力量，它是一种社会“顽症”。这种顽症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整治？为此，研究教条主义及其根源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